

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的100件大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中国卷）

黄 勇 / 主编

10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义和团运动	(2569)
概 况	(2569)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2574)
八国联军的武装进犯	(2583)
廊坊大捷	(2596)
八国联军侵华	(2601)
概 况	(2601)
聂士成八里台壮烈殉国	(2605)
北运河沿岸之战	(2606)
北京防御战	(2609)
《辛丑条约》的签订	(2613)
辛亥革命	(2617)
事件概况	(2617)
中国同盟会成立	(2635)
《民报》出版	(2638)
革命派与改良派	(2641)
萍浏醴起义	(2647)
保路运动	(2650)
武昌起义	(2653)
辛亥南北议和	(2656)

复辟与反复辟	(2661)
袁世凯的窃国复辟	(2661)
讨袁护国运动	(2664)
讨袁战争	(2666)
护国战争	(2673)
洪宪帝制的覆灭	(2679)
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割据	(2679)
护法战争	(2684)
五四运动	(2691)
事件背景	(2691)
五四爱国运动	(2698)
军阀争战	(2704)
北洋政府	(2704)
江浙战争	(2712)
奉浙战争	(2716)
第二次直奉战争	(2722)
郭松龄反奉之战	(2728)
中共成立	(2735)
背景及发展概况	(2735)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2741)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农民运动的兴起	(2747)
新军阀混战	(2754)
事件概况	(2754)
刘文辉吞并刘成勋之战	(2756)
龙云与胡若愚云南之战	(2760)

冯玉祥与张宗昌河南之战	(2764)
龙潭之战	(2769)
宁汉战争	(2775)
蒋桂战争	(2779)
蒋冯战争	(2784)
唐、石联合反蒋之战	(2789)
桂粤联军反蒋之战	(2796)
蒋、冯、阎中原大战	(2803)
张、蒋讨石之战	(2815)
宁粤战争	(2820)
韩复榘与刘珍年山东之战	(2824)
刘湘与刘文辉四川之战	(2827)
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新疆之战	(2834)
孙殿英与马鸿逵宁夏之战	(2841)
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2846)
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2846)
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2853)
国共分裂	(2857)
“四·一二”政变	(2861)
南京国民政府	(2863)

义和团运动

概 况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兴起于长江以北各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和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被清廷镇压后，白莲教的各个支系继续斗争，北方几省相继出现了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组织，秘密从事反清斗争，其中八卦教影响最大。朝廷规定，传习八卦教者要查拿缉捕，为首者处以死刑，于是八卦教徒便以传习拳术来隐蔽自己。义和团运动便由此萌芽而来。

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沿海民众遭受日军侵略之苦，战争结束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三年后，日军撤离，此地又立即被英军强占。不久，德国又占据了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随之外国教会也随入大批进入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 1100 多座，传教士和教徒发展到八万多人。许多加入教会的地主豪绅，仰仗教会势力，乘多年荒灾之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居众苦不堪言，对之切齿痛恨，多次与教会发生冲突。

当年十月，山东冠义县义和拳在闫书勤带领下，聚众数千人，树起“助清灭洋”的旗帜，占领了梨园屯。第二年，

平原县义和拳组织和教会发生冲突，地方官吏派兵镇压，逮捕了数名义和拳成员，于是他们向往平县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求救。朱红灯率领几百人的义和拳武装成员赶到平原，与当地义和拳群众会合，使官府十分恐慌。济南知府带兵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与朱红灯的队伍发生争斗。此时，茌平、恩县、长清、高唐等地义和拳纷纷响应，不久，东昌、武定、泰安、济南等地的群众也闻风而动。面对义和拳运动的蓬勃兴起，清朝官吏内大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立即用武力消灭，一种则主张安抚、收编。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要求采取安抚、收编政策，主张“化私会为公拳，改拳勇为民团”，把拳民编到诸乡团之内。次年二月，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出告示改“拳”为“团”，把参加义和拳的群众称之为“拳民”，允许他们设厂习拳，同时把武装反抗教会的人称为“匪徒”，缉拿惩处，借以安抚义和拳。由此一来，义和拳反倒取得半合法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官方默许的公开团体，“义和团”的名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开始逐渐地广为流传起来。

山东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引起在华各国势力的恐慌。驻扎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抢劫城镇抢杀居民。英、美、意等国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廷下令取缔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美国公使唐格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撤换毓贤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申斥毓贤对义和团镇压不力，将之调任山西巡抚，由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不承认义和团具有合法性，规定：不仅练拳，就是赞成义和拳的，都要被杀。随后依仗

他统带的武卫右军和扩编的武卫军先锋队马步炮队共二十营兵力，对活动于山东黄河北岸的义和团发起进攻。先后斩杀了王玉振、王文玉、孙洛泉等义和团首领，消灭十多部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运动告以平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移到了直隶省。

早在两年前，直隶南部威县，曲周、景州、阜城义和拳就已经开始活动，许多村庄建立拳厂、练习拳术，并逐渐向北发展，与教会和官兵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直隶总督裕禄根据上谕发布《严禁义和团》的告示，宣布“招引徒众，私立会合，演习拳棒，均属违禁犯法”，“再有设厂练习拳棒，射利惑民悖事，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此时总理衙门也对此忧心忡忡，电令裕禄，“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于是裕禄派出官兵，分路对义和团进行镇压。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没被镇压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势力扩展到直隶全省，直逼京城附近地区，甚至在京城内和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也已经有自称义和团的人开始活动，沿街练拳，招收徒弟。

消息传到清廷，有官员主张对义和团用兵讨伐极其危险，应采取安抚政策。是年四月初，监察御史郑炳麟上奏，主张在直隶、山东派道府大员当“团练局总办”，选择乡绅做“团总”，收编义和团，把义团改造为官办的团练。这个建议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一时间清廷陷入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的两难境地。

四月初，涞水、定义、新城、涿州、易县等地的义和团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焚烧了当地的教堂，随后裕禄派军队前往镇压，遭到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淮军副将杨福同被打

死。裕禄随即又派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武卫前军赶去镇压，又遭到义和团的抵抗。义和团以“反洋”的名义破坏了芦保铁路，阻止前来镇压的清军。继而相继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的火车站，京津铁路上的丰台站和机器制造局也被捣毁。五月初，义和团拥进涿州城。

慈禧太后见形势十分紧迫，就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翹、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方向去进行招抚，向义和团宣布朝廷的“德意”。刚毅等人到涿州一带后，感到义和团势力极大，不能进行剿杀，于是向朝廷报告，主张撤回聂士成的部队，采用劝导、晓喻的办法解散或收编义和团。

正当刚毅等人在涿州一带活动时，京城内的义和团活动越来越频繁，声势也越来越大。小股外县拳民陆续涌入北京城，城内居民也纷纷加入义和团，出现了以义和团名义出现的反对洋人的揭帖，公开设立坛棚，焚烧外国人的教会房屋，并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朝廷屡次下令解散、严禁、缉拿，均无济于事，到了不能控制的局面。与此同时，天津城内义和团活动也十分频繁，烧毁教堂，进攻紫竹林租界，捣毁监狱，释放犯人。这时裕禄不得不改变手段，由高压转为安抚，以总督名义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并用轿将他抬到总督衙门。

这年四月，英、美、德、意已派兵船驶入大沽口，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剿灭义和团。不久，十一国公使又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团民练拳设堂，传布揭帖，并命令各国的大沽口的海军准备登陆。五月二十八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

兵来北平，并将此决定通报给总理衙门。经过一番交涉后清政府退步了，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派兵入京，要求兵数少一些，随后又通知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津入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几天后，英、俄、德、法、日、美、意、奥等国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另一支外国联军六百多人，由塘沽登陆开进天津。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发。裕禄虽想阻止他们，但联军仍然取得了所需的机车和车厢，开始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路上，联军遭到义和团的反抗。义和团拆毁铁路，致使联军四天里才走了一半路，抵达廊坊。一天早晨，义和团在廊坊车站袭击联军，几天后又再次袭击。此时去往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好退回天津。

六月十六日起，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主剿主抚两派争执不下。权衡利弊，慈禧太后决定宣战，“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宣战上谕”内容极其含糊，令有些属下不知所措。同时，慈禧又面谕李鸿章，让他去向各国保证对义和团要“设法相机自惩办。”由此，义和团受到内外夹困。

正在朝廷举行御前会议期间，联军以朝廷当局“并不倾力剿办”义和团为借口，炮轰大沽口炮台，并迅速将其占领。随后又水陆并进，进逼天津，义和团与之顽强作



西摩尔

战，双方激战一个月之久，此时聂士成的部队加入了反抗联军的战斗。义和团曾一度占领了紫竹林租界。在激战中，联军投入上万人的兵力，而清军主力却按兵不动，致使义和团力单难支。七月十四日，天津被联军攻破。与此同时，北京义和团向东交民巷使馆发起进攻，相继烧毁了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四国公使馆，连续围困各使馆五十六天。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于八月初向北京进攻，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清军却节节败退，致使联军前进速度很快。八月十四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

义和团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民间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秘密结社的一种，有的属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它长期以来在山东、河南、直隶、苏北一带从事反清斗争。由于19世纪初期的白莲教起义曾经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它一直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邪教”，严加禁止，嘉庆时还专门发布过残酷镇压白莲教的“上谕”。但是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并未止熄，义和拳继续进行反清秘密活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义和拳也就从反清的秘密结社，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

织。大刀会也很快同义和拳汇合起来，成为山东义和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反帝斗争的迅速发展，义和拳的组织也迅速扩大，它的社会基础、组织程度、斗争目标和运动规模，都远远超出了白莲教的范围，它已不再是单纯的反清秘密结社，而成为一个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的反帝斗争目标的革命团体。

义和拳兴起不久，清朝政府和山东的地方官吏，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实行残酷镇压。1899年4月，毓贤升任山东巡抚以后，即先后八次下令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诸名目，不准设厂学习拳勇，并在8月间杀害了



义和团拆铁路

活动于济宁、嘉祥、汶口、巨野等地的义和拳首领陈兆举等。但群众的反帝斗争是禁止不住、镇压不了的，义和拳“灭洋人，杀赃官”的吼声响彻大地，反帝斗争的怒火熊熊燃烧，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1899年初，山东义和拳著名首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在茌平、高唐一带发动义和拳和当地群众，展开了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1898年来到长清县大李庄，参加义和拳以后，在长清、茌平等地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扩大义和拳队伍，成为当地义和拳的重要领袖之一。心诚和尚，出家前叫杨天顺，高唐县人，贫苦农民出身，很

早就在禹城县丁家寺设厂练拳，也是禹城、高唐、茌平等地义和拳的重要首领。

朱红灯率领的义和拳在茌平、平原英勇斗争，屡败清军，使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恐慌万状。毓贤又派济东道吉灿升督同游击马金叙，率领大批反动军队到茌平镇压。马金叙以阴谋手段诱捕朱红灯、心诚和尚，并在朱红灯与义和拳的来往书信中，发现“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的计划。1899年12月，朱红灯和心诚和尚惨遭杀害。

朱红灯虽然壮烈牺牲，但是义和拳并没有被吓倒，仍然继续坚持斗争，力量不断壮大。到1900年春，直隶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广大贫苦农民，同时也有不少手工业工人、沿海渔民、运输工人等参加。清军中的一些士兵，也有参加义和团的。正是这些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甘心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他们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向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猛烈的进攻。

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各支的首领一般称“大师兄”、“二师兄”。参加者以青年为最多，妇女和少年儿童，也是义和团的主要力量。“京城演习义和拳者童子居多”，“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这些青少年习拳练武最积极，打仗最勇敢。青年妇女参加义和团称为“红灯照”，成年妇女称“蓝灯照”。

义和团有严明的纪律。例如，义和团在从景州向涿州进军途中，只“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途中相遇，秋毫无犯”。又如义和团在涿州攻打双柳树村教堂时，“仅伤两教民而逸，室中一物未失”。

各地区的义和团，在反帝斗争的共同目标下，虽然互相联络，互相支援，但是由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立即投入“灭洋”的战斗，所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各个地区的义和团始终处于分散作战的状态。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袁世凯对义和团实行残酷镇压，山东各地的义和团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还要与袁世凯的反动军队作战，因此，这个口号在山东地区实际并不甚流行。随着义和团进入直隶和斗争的迅速发展，“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就比较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之上。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

早在山东义和团起义时，直隶省南部和临近山东的故城、景州、阜城一些地区也兴起了义和团活动。他们一面广设“拳厂”，练拳习武，扩大组织，一面发动反洋教斗争和抗官斗争，使得一些地方官吏，“欲拿不得”，束手无策。到了1900年四、五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经几乎遍及全省所有的州县，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帝洪流。

直隶的义和团逐渐由南而北，向天津、北京等清朝统治者的心脏地区挺进。义和团的反帝宣传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沿路反洋教、抗官兵的英勇正义行动，给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各地群众响应义和团，纷纷要求拜坛入团，革命的队伍迅速扩大。向北京进发的义和团在人民的声援下，迅速占领了献县、河间、任丘等一批县城。当义和团进入河间府辖内的任丘县时，遇到清军阻击，双方激战，大败清军，清军统带官受重伤，兵士被杀多人，知府也受刀伤，义和团又攻占



义和团摧毁教堂

白洋淀，所向披靡，迅速向北京挺进。

义和团向京津进军，使帝国主义惊恐万状。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合伙出面骄横地要求清政府，“限两个月，将义和团剿除净尽，否则

四国发水陆各军入东、直两省，自行平乱”。直隶总督奉命一再发出告示，对义和团民要“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就地正法”，还派重兵分赴津南及芦保铁路沿线“随处稽查，随时弹压”。但是，威吓和弹压丝毫不能阻挡义和团的前进。5月，义和团占领定兴，并以定兴为中心向外扩展，控制了新城、涿州、涞水和易县一带广大地区。义和团又乘势迅速占领了北京南面战略要地涿州。裕禄急忙调全副新式装备的王牌军——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军”，妄图以大规模的围剿镇压义和团，阻止义和团向北京前进。义和团为了粉碎聂士成的围剿，切断清军南北增援部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首先扒了芦保线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琉璃河的铁路，放火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等车站。接着又乘胜袭击京津铁路，焚毁了丰台车站和洋务派操办的机器制造局，连西太后的“龙车”也付之一炬。义和团大规模的举动，切断了清军南北联系，使之孤军作战。相反，义和团却集中力量，南北驰骋杀敌。六月初，聂士成军被迫撤回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已无力控制直隶的形势了。

义和团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京津已处于兵临城下的形势。

六月上旬开始，义和团主力陆续进入北京。一队队头裹红巾，腰扎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队伍，三、五十人不等，不分昼夜，一日数十起从京郊各县拥进北京城里，入城后，义和团严格地遵守纪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向天津进发的义和团，由于沿途几次遭到清军重兵阻击，损失较大，而改由文安、霸县、静海等地逼近天津。六月中旬，继进入北京之后，义和团又开进天津城。

义和团大队人马进入北京、天津，守城的清军士兵在义和团反帝爱国宣传的影响下，不但不加拦阻，甚至替义和团喝道开路。这时，皇宫的宫门、清政府的衙门、王公贵族的住宅，都有义和团派人监视。大路口以及内外城各门，都有义和团把守，日夜盘查可疑的行人。义和团在北京树立了群众斗争的权威。他们经常在街上列队示威，高呼“杀洋鬼子！”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只好麇集到东交民巷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准备顽抗。

6月14日，天津团民将城内教堂焚毁。16日砸毁了一向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海关道署，又趁势进入军械所，缴获无数枪支弹药。北京义和团也焚毁了宣武门内、前门一带的一些教堂。

义和团进入北京，说明它的力量不断壮大，统治者无力镇压；同时说明清廷统治者在帝国主义侵略军步步紧逼下阴谋改造、控制和利用义和团。为了控制义和团组织，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任命顽固派首领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

澜、刚毅、英年佐之。凡五城散团及新参加义和团的，都要到王府“报名注册”。乾字团归澜公府统率，坎字团仍归庄王府统率。在庄王府挂号的名曰官团，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没有挂号的叫做私团，无“奉旨”字样。清政府还颁布了《义和团团规》，作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团规》强调，义和团要和官军“联成一家”，“各团师兄，应与兵勇彼此和睦”，义和团“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这样就把义和团和清军同样看待，形成兵团“遂合为一”的局面。

随着义和团组织被控制，参加义和团成员的成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原来“乡愚务农”的尚能保持“粗食布衣”外，而在北京城内新参加的，有些虽然“打扮相同”，而衣着旗帜“皆多绸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北京城内一时“上自官吏，下及黎庶，已成义和拳‘匪’世界。”可见北京义和团的成分已相当复杂了，这不能不影响到义和团的行动。

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以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帝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其中特别是东北三省、山西、内蒙等地，义和团的斗争较为激烈。

山西省毗连直隶，1900年5月始，以省城太原为中心，义和团运动遍布全省各地。6月27日义和团焚毁了向义和团开枪挑衅的太原东夹巷教堂。7月10日又烧了大北门天主教堂。11日，太原东南榆次县什贴镇义和团进入太原，迫使山西巡抚毓贤不得不将义和团迎入巡抚衙门。至此，山西义和团活动进入高潮，整个太原已为义和团所控制，全省四五十个州县都展开了义和团的活动，拆毁教堂七八十处，